

“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贺 渊

内容提要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 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 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 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 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关键词 陶希圣 和平运动 汪精卫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间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打响,在全国高涨的抗日形势下,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一些国民党要员形成了一股势力,自诩“低调”,开展了一场旨在寻求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所谓“和平运动”。陶希圣是“主和”派理论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也是推进“和平运动”实践的骨干。但是,1940年1月,陶希圣和高宗武从上海出逃至香港,在《大公报》上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公之于众,披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揭开了汪伪集团的投敌面目,陶希圣和高宗武成了“和平运动”最大的敌手。反差如此强烈,让人们不知何为真实的陶希圣。

此后多年,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和回忆录不少,最有分量的当属金雄白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①、高宗武所著《高宗武回忆录》^②、陶希圣之子陶恒生所著《“高陶事件”始末》^③、参与诱汪投敌的日本人犬养健所作《诱降汪精卫秘录》^④以及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回忆录《我走过来的路》^⑤等书,因作者特殊的身份,能够在专著中披露他人难以得知的翔实细节。学

①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台北,季敖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犬养健著,任常毅译《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参见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

者蔡德金所著《汪精卫评传》^①、《讨逆集》^②等一系列有关汪伪“和平运动”的专著，张殿兴的《汪精卫附逆研究》^③，台湾学者陈木杉的《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④等等，力求客观地研究“和平运动”，必然对陶希圣多有涉及。除此以外，一些有关陶希圣的专题论文包括：余文祥的《陶希圣随汪反汪的前前后后》^⑤、孟瑞星和左永平的《也谈陶希圣与“和平运动”》^⑥、何东华的《半截子汉奸——陶希圣》^⑦、方秋苇具有回忆性质的《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⑧等也陆续问世，直接楔入陶希圣与“和平运动”的关系问题。在目前已有研究中，对陶希圣参加和脱离“和平运动”等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有人将陶看成是追逐名利不得的反复无常的汉奸；也有的论证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有的怀疑陶是蒋介石的卧底，甚至推断他是故意陷汪于汉奸之地的推手；也有的将上述观点综合起来加以论述。陶希圣此时角色难以定位，主要原因是史料不足。目前学界能够使用的资料主要包括陶希圣写给胡适、何兹全的信；黄美真、张云编的《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一套三册^⑨、陈鹏仁的《汪精卫降日秘档》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档案资料^⑩。权威性的涉及陶希圣的第一手资料相对较少。而具有佐证价值的《周佛海日记》正好遗失1939年部分。所幸，台北“国史馆”所藏“汪兆铭史料”和“蒋中正总统文物”之中存有1939年至1940年1月6日陶希圣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来往信函30余封，为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另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夏侯叙五著《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一书披露的陶希圣写给高宗武的信，也谈及一些；另有尚未出版的《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台北“国史馆”馆藏的戴笠资料，可以起到佐证的作用，从而便于了解“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一、“和平运动”之初不可或缺之人

1937年7月，陶希圣作为北方学者受国民政府邀请到庐山牯岭开会，讨论国是问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陶希圣放弃学术生涯，加入到现实政治生活之中，投身于“和平运动”。

庐山会议前后共两期：7月16—20日为第一期，蒋介石因为战事紧张，匆匆下山；7月26—29日为第二期，两期会议均由汪精卫主持。参加者主要是学者、社会名人和政府要员。会议之前，国民党内部规定官方代表只听不发表意见，所以主要以学者和社会人士发言为主。庐山会议上主流声音，自然是高昂的抗日呼声，蒋介石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是全面抗战的最后关头，把抗日的热情释放了出来。也正是在这篇讲话中，蒋提出“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⑪寻求“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

①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蔡德金《讨逆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张殿兴《汪精卫附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

⑤ 余文祥《陶希圣随汪反汪的前前后后》，《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3期。

⑥ 孟瑞星、左永平《也谈陶希圣与“和平运动”》，《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1卷第1期，2005年3月。

⑦ 何东华《半截子汉奸——陶希圣》，《人物春秋》2006年第1期。

⑧ 方秋苇《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民国档案》1992年第3期。

⑨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1984年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1984年版）、《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1985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 比如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黄美真编《伪庭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周佛海《周佛海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等等。

⑪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4页。

成为会议期间的第二个声音。陶希圣大约在7月15日登上庐山,7月30日下山,参加了前后两期会议。在会上,陶希圣发言不多,但会下却比较活跃。他与旧时同志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重逢,并就对日问题相互交换意见。1937年7月16日周佛海日记载有“十一时散会后,与汪先生、公博、希圣、思平等谈北方情形。”^①这张名单中的人,后来竟然全部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显然是他们发现相互拥有共同的观点,而应该不是巧合。其中,陶希圣与周佛海来往尤为密切,几乎每天碰面,不时长谈。牯岭会议,仿佛为“和平运动分子”搭建了一个交换意见的平台。^②

7月22日,陶希圣给陈布雷送去一封他和胡适联名所写的信,陈布雷当天将信中意见转告蒋介石“胡适之、陶希圣两君意见:1. 宋签字如不显与中央指示四点^③相违,中央应负起和平解决责任,以示战则全战,和则全和之姿势,决不宜推责于宋,内生隔膜;2. 同时退兵,虽有确认所谓何梅协定之嫌,然此次已开彼进兵则我亦进兵之好例;3. 中央负起和平解决责任在外交上为一进步,亦可使彼方认识华北问题已非与中央交涉不可;4. 如能于同时退兵之中再开一要求丰台撤兵之端,则更为一大进步,但此点须俟外交军事全局有无贯彻主张可能尚应郑重考虑。”^④这是陶希圣、胡适首次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提出对日问题的意见书。

这封致蒋介石的信虽然以胡适、陶希圣的名义发出,实则汇集了陈布雷、周佛海、陶希圣、胡适、汪精卫的共同意见。21日,陈布雷得到消息: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与日本方面就卢沟桥事件的谈判已完成,并已在条约上签字,具体内容尚不清楚。陈布雷感到宋哲元的举动会使“中央处理此事益感棘手”。^⑤傍晚,陈布雷“约希圣、佛海到余寓晚餐,餐后长谈,十时始散”。^⑥第二天,陶希圣交出致蒋介石的信,因此,他们信中的观点,应该与前一晚上“餐后长谈”有关。而汪精卫几乎在此同时给蒋介石发出函电说“此次进兵保定,已明示政府于领土内认为有驻兵之必要时决不受任何拘束”,他认为此行为开了一个敌人进兵我们也进兵的好例,汪函又说“中央负起和平解决之责任,虽为屈辱,但已能使日方认识此后地方问题,有非与中央交涉不可之势”。^⑦可见,胡适、陶希圣的意见和汪精卫完全一致。

胡适、陶希圣的信和汪精卫的补充意见集中的要求就是:中央负起责任,“战”与“和”均由中央政府出面,而不是地方性的局部解决。虽然,他们的信主要针对卢沟桥事变,但显然更强调“和”字。另外“负责任”三个字,成为“和平运动”标志性的词汇,用以体现“和平运动”参加者超乎一般的真挚的“爱国”情怀,以及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因此,通过牯岭会议,“和平运动”分子得到了最初的集结,陶希圣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

7月底,陶希圣从庐山下来后来到南京,住在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公馆。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

^①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 梅思平、陈布雷与陶希圣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1945年梅思平在《自白书》中,曾经透露当他在会议上听马君武高唱焦土抗战时“余之感想,以为战争谈何容易,胜则万幸,败则从此万劫不回。”(南京市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1937年7月2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想法:战争不是一两年能够停得下来的,“背城借一亦应有一借,故余之主张为‘能忍即忍,能和即备’八字云。”(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未刊稿),台北,东南出版社承印,第230页)

^③ 指以蒋介石之名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一文中所述“1.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4页)

^④ 《陈布雷致蒋中正电》(1937年7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卢沟御侮(一) 002—090105—00001—051。

^⑤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7年7月21日,第229页。

^⑥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7年7月21日,第229页。

^⑦ 《汪兆铭致蒋中正电》(1937年7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卢沟御侮(一) 002—090105—00001—128。

解决中日问题的人们,以周佛海、胡适和陶希圣为核心,逐渐聚成一个团体,即“低调俱乐部”。^①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并不仅仅是与“高调”抗日者唱对台戏,只为放言“低调”,他们拥有明确的目标,对此,胡适说得很清楚:“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 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②所要创造的“奇迹”就是“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③从事实来看,他们是有一定分工的:高宗武、梅思平主要对外,即与日本联系接触,了解其意图,寻求合作的可能;周佛海、陶希圣主要对内,重点在游说蒋介石,促使蒋同意与日本方面进行对话和谈判。周佛海处于中心的位置,而他的背后,隐约可见汪精卫。

7月31日,周佛海、陈布雷、胡适的日记,记下了同样一件事,即蒋介石宴请北方来的张伯苓、梅贻琦、胡适之、陶希圣,从中可见陶希圣、胡适受周佛海之托向蒋介石进言,要求立即开始外交活动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1937年7月31日周佛海、陈布雷、胡适日记对比

	周佛海	陈布雷	胡适
7月31日	“旋访希圣,公达到,咸以为须立即开始外交活动。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 ^④	“十二时卅分到官邸,招待张伯苓、梅贻琦、胡适之、陶希圣诸君。一时委员长与四君接谈,论大局形势,至为明晰。伯苓先生老成慷慨,谓国事非一时泄愤所能有济,及闻委员长指示之言,知政府有整个准备,则表示欢慰不置。” ^⑤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⑥

从上述日记可见,席前,周佛海考虑到各自的身份,认为陶希圣适合向蒋进言,故而嘱他“乘机进言”。但是,席间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坚决,虽然表示只能坚持六个月,但分析大局,令在座的人知道“政府有整个准备”,外加张伯苓“附和之”,结果造成的氛围,令有备而来的胡适只能略微进劝,陶希圣默不作声。陶希圣等人赴宴后,周佛海一直在等消息,直到下午两点半陶希圣回来,可见,周佛海劝蒋之心最切,陶希圣反而较沉着,劝周不要操之过急。

8月5日下午四点左右,胡适与陶希圣应汪之邀,前去谈话^⑦。下午五点,陶希圣与胡适前去拜

① 八一三淞沪之战后,为避日机投掷的炸弹,继陶希圣之后,梅思平、罗君强、郭心崧等也一度住到有防空洞的周佛海公馆,陈布雷经常跑来避空袭,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胡适穿梭往返,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抗战前景感到很不乐观,以唱低调自诩,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一说“低调俱乐部”之名来自于胡适的调侃;高宗武则认为是自己的一句话起了作用“我虽然姓高,但我只会唱低调”,传扬开后,得此名称。

②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7月31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1页。

③ 原文是“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9月8日,第710页)

④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7月31日,第55页。

⑤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7年7月31日,第231页。

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7月31日,第700页。

⑦ 《汪精卫致胡适》(1937年8月4日),胡适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

访蒋介石结果未遇很是惆怅,当天晚上,陶希圣执笔,就时任驻华大使的川越茂^①从天津南下写信给陈布雷,再次让陈向蒋转达他们的意思“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1.为拒绝其入京;2.为积极表示政府准备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二断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地方纷争之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陈布雷感到“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意见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②次日上达蒋介石。

胡适手写的条陈附着于8月5日陶希圣给陈布雷的信后^③,将陶希圣的函件中所说的观点更加具体化,其内容如下:

原则: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 中华民国政府在左开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得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在相当时间,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河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河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到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 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的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 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 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五) 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外交手续:

1、两国政府商定上项方针(不公布)之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退两国军队,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原状。中国军队撤退之长城线外。北平天津及河北省曾被日本军队占据地域内之政务警务由中国政府派文官大员接管。其治安维持,由中国保安队担负。两国政府宣布撤退军队时,同时声明在公布之后三个月之内,由两国选派全权代表在指定地点开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

^① 七七事变后,川越茂从上海跑到天津,以“避暑”为名不再出面中日交涉之事。8月3日,他离开天津南下。

^② 《陶希圣致蒋中正电》(1937年8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和平酝酿(七) 002—080103—00033—003。

^③ 《陶希圣呈蒋中正中日外交意见书》,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和平酝酿(七) 002—080103—00033—004。

2、第二步为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依据两国政府会商同意之原则与方针作详细的节目的讨论。此第二步之谈判,应不厌其详,务求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树立新的国交。谈判期间不嫌其长,至少应有两三个月之讨论。交涉之结果,作成详细条约,经两国政府同意后,由两国全权代表签字。

综合陶希圣、胡适的意见,就是以承认满洲国、失去东三省为代价,保持长城以北的主权,实现与日本间做根本的“了断”。陶希圣、胡适等首次将他们的底线亮了出来。这个底线,应该也是汪的底线。然而,他们的主张在坚持抗战的人们听来就是“汉奸”言论,蒋介石则以为日本人没有信义可言,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前期所讲“大战前之外交努力”显然不合时宜,“低调俱乐部”有了新的议题——如何边打仗边寻求和平。8月16日周佛海的日记称“与适之、希圣密商外交进行办法,为此次战争下场之准备。预计三个月后可开始外交,未知能否天随人愿也。”^①首次用了“密商”二字,再度明确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淞沪之战。两天后,8月18日,高宗武到周佛海处,和周谈了自己与汪精卫谈话的情况。晚上,周佛海约陈布雷到他家,一起与高宗武等谈了很久,陈布雷由此“知胡、陶诸人有重要救国意见陈述”。^②谈话时,陶希圣不在场,胡适在日记中说“希圣今早七点过江去接夫人与小孩,到半夜还不曾回来”^③,似乎是在等他回来。因此,周佛海所谓胡、陶“有重要救国意见陈述”是他们之前已经共同商量好了的,一如以前只不过由胡、陶出面进言。

8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们再次见蒋介石的过程,他说“昨夜谈话的人——高(宗武)、周(佛海)、程(沧波)——所谓‘低调同志’,他们要我与希圣再去见蒋先生一次。”^④第二天,“陈布雷先生今早替我们约定下午去见。希圣来谈。下午四时半我们去见蒋先生。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有许多话不便谈。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他不应兼军与政)。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呢?”^⑤他们的第二次当面劝蒋还是无功而返。谈话中,蒋介石要胡适去美国当大使,使开始对“和平运动”产生怀疑的胡适,因此与“和平”主张者渐行渐远,这恐怕是他们没有料到的结果。不仅如此,8月23日,陶希圣见汪精卫之后,告诉周佛海“蒋先生不愿派宗武赴沪见川越,因其为正式外交官。闻之不胜失望,盖吾辈日来详商结果,均主宗武即赴沪作外交进行也。”^⑥

蒋介石的态度,令周佛海和陶希圣感到直接进劝成功率不高,于是,他们希望通过汪精卫与蒋沟通。主张“和平运动”的人中,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下属,不便直接与汪接触;陶希圣、陈公博属于汪精卫的“亲兵”,陶希圣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加入汪的阵营,后来又成为改组派成员,到此时,两人交情已逾十年,外加陶希圣拥有教授的在野身份,便于随时和汪联系,因此,“低调俱乐部”往

①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8月16日,第19页。

②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7年8月18日,第234页。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8月18日,第704页。

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8月19日,第705页。

⑤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8月19日,第705页。

⑥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8月23日,第63页。

往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沟通。^①8月30日,周佛海一早八点“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汪允向蒋先生力言。返家后,约适之、宗武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由宗武起草。晚,宗武携草稿至,与斟酌,略加修改。余并抄一副本,交天翼随时进言,正本决由希圣明晨送汪先生转陈”。^②

这份由高宗武起草陶希圣递交给汪精卫,再由汪精卫转呈给蒋介石的文件,署名是谁不清楚。目前,可以在台北“国史馆”看到陶希圣向蒋介石递交的一份《中日外交意见书》无论从内容看还是时间看,应该是同一文件。陶希圣的《中日外交意见书》提出:1. 外交与军事并进为必要,“军事应取扩大之策而外交当有收束之备”。他分析国际情势以为,当下列强都只取备战而避战之政策,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全部力主和平,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如果一旦打败,列强势必会牺牲中国为代价,求得和平;就国内来说,我国目前仅得统一雏形,但因此而遭日本忌恨,在我统一还没有成熟之时,对我进行猛烈的侵略,陷我入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若打,六年来的积累消耗殆尽,社会或又呈分崩之状,如不打,就是屈服也可能分崩。他的观点是“何不于军事尚可支持之时,力作外交之运用,庶乎败不抱佛脚而捷亦可乘时。”他指出目前朝野之大患在将外交交涉视若议和,议和等同于汉奸,这是很肤浅的推理,作为宣传可以,但不能作为国家的政策。他的上述分析应该颇合蒋介石的意图,“安内”不得,一直是蒋介石的心病,他在文中特意指出这一点,意图在打动蒋。陶希圣不同意“万事皆委于一战”,从行文来看,他认为战与不战,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都没有胜算,在他内心,“捷”不可能,所以是为了“败不抱佛脚”,在尚未败时即作打算,在本质上,仍然是外交上作一番努力。2. 提供准备交涉的三种方法:以要员直接与川越作侧面而有力之民间秘密周旋,在京沪急转直下以达于正式谈判;派在野重要之人直到东京访问近卫与广田乃至军部,作开始谈判之先声;在伦敦由中国驻英大使经过或不经过英国外交部之周旋,与日本驻英大使开始作谈判之准备。他本人比较赞同第三种办法,既可得国际之周旋,且对军事无直接的影响。3. 准备交涉的步骤是:先以中国最高限度及最低限度之条件,以秘密恳谈的方法,取得两国之谅解,然后公开谈判停战。停战协定成立后,恢复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前之状态,然后就中日关系公开谈判。4. 所谓最高最低限度之条件,就是“以最高限度之代价,换取独立自主之民族国家生命是也”。“所谓独立自主之存在,一则如政治经济组织之完整,二则如国防之自由建设,三者如国际关系之自决”,此为最低限度之条件,“宁割地而不丧权,不复效过去宁丧权而不肯割地,以致地仍失而权亦不保”,为最高限度之让步。^③

但是8月31日“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

^① 《周佛海日记全编》记载,每到关键时刻周佛海即通过陶希圣向汪转达意见或探听汪之意图,直到1938年2月艺文研究会成立后,周因为工作关系,才与汪有较多的直接接触。比如1937年9月3日周佛海记有“7时起。与希圣谈,请其劝汪勿灰心,盖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示,自不能不强硬也。”(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66页);9月11日,“希圣谒汪回,谓蒋先生曾向汪表示,战事适可而止及由英、美调停原则,均甚赞成,惟恐日人要价过高。因与希圣商明日访公博,请其转托大使,探询本日(日本)真意。”(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70页);9月29日,“参加国防参议会……到六时,希圣谒汪回,对时局极悲观,因之食不甘味,草草晚饭。旋相约赴济安家聚谈,心为之稍宽,但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76页);11月16日,“希圣谒汪回,谈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调解方案,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93页);11月28日,周“嘱希圣,嘱其谒汪,探大局有无转机。”(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98页);1938年4月2日,周佛海日记中首次记下“下午赴汪先生家,会同岳军、力子、公博,审查抗战建国纲领。”(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107页)似乎是登堂入室了。

^②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8月30日,第65页。

^③ 《陶希圣呈蒋中正中日外交意见书》,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和平酝酿(七) 002—080103—00033—004。

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①周佛海日记上的这席话，活脱脱地呈现出陶希圣和周佛海当时沮丧的情景。

蒋介石的拒绝令陶希圣不甘心，他整理了自己的想法后，于1937年9月10日直接致电蒋、汪，自称虽然时局不宜再唱“低调”，但“军事与外交相反相成之原则，及军事事求尽量扩大战争而外交谋随时收束时局之理论，自信仍有坚持之必要”。外交上他主张“近苏、亲英、友意德，而与日本开交涉之路”；除借用第三国周旋外，“中日之直接谈判，当并用之”。陶希圣以中国如果打到底没有胜算为前提，提出淞沪会战的意义不在取得胜利，而在为“和”增加砝码，要求中央乘胜而“和”。^②这篇电文，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体现了陶希圣的执着。

在抗战的最初阶段，陶希圣积极参与“和平运动”，根据形势的变化，寻求和平之路具体方法。他与胡适至少三次见面蒋介石，四次以上给蒋发电写信，提出所谓“和平运动”的理由和基本目标，力促蒋介石及其政府与日进行和谈。陶希圣周旋于蒋介石、汪精卫、“低调俱乐部”之间，充当着调人的角色。正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的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陶希圣在“和平运动”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之人。

二、组织艺文研究会宣传“和平”理论

随着上海战事的紧张，胡适的离开，10月初陶希圣本人到了湖北，“低调俱乐部”星散。但“和平运动”并没有停止，其中心由南京转向内地。1938年2月，陶希圣和周佛海在汉口特三区天津街四号创办艺文研究会，起初总部设在汉口，1938年6月底迁往重庆菜园坝。该社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不公开，在长沙、西安、重庆、香港还设有四个分社，在成都、昆明等城市有通讯员。

艺文研究会的建立，和陶希圣尚存一段渊源。1937年夏，蒋介石召见陶希圣，说共产党在武汉活动，闹得不成样子，让陶希圣去一趟传达抗战的宗旨与目的。蒋之所以派陶希圣去，是有原因的。1931年到1937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经历日本鲸吞东北，蚕食华北，逐渐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和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过程，目睹“一二·九”运动、义勇军抗争、长城抗战等各界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但是，陶希圣对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心存怀疑，所以和胡适等《独立评论》的人一起，自诩“低调”。^③陶希圣的反共立场，引起中共的注意^④，并得到汪精卫和蒋介石的赞许。

1937年10月2日至11月8日，陶希圣在武汉住了一个多月，在中华大学和其他学校讲演，“对中共作观念上与思想上的斗争”。^⑤陶希圣回来后向蒋、汪汇报所见所闻，指出湖北商业停顿、工业不足、金融钝滞、壮丁问题触目惊心，思想上人民阵线活动几有“国裂党亡”的恶果；中共高调

^①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7年8月31日，第65页。

^② 《陶希圣致蒋中正汪兆铭函》（1937年9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和平酝酿（七），002—080103—00033—006。

^③ 1936年5月10日，陶在北京发表了《低调与高调》的文章。他在文中所说的“低调”，就是主张民族的解放，而将主张社会运动，主张阶级斗争的观点视为“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④ 1936年10月11日《红中社电讯》中报导苏维埃政府发言人的讲话，针对“关于社会人士例如陶希圣先生等对于我们所发表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基本表示赞成，但言外之意似乎认为我们的主张不过用来作政争的工具，绝无诚意”进行驳斥，并对陶希圣的观点作出正面答复。（《外间若干人士对于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各方民国25年10月往来电文录存，116—010108—0344—095）

^⑤ 陈存恭、苏启明、刘妮玲访问，陈存恭、尹文泉总整理《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版，第65页。

号召国民党党员“引敌(指中共)自重”。他认为应该以“严密特防”和广泛教育为手段扭转武汉的现状。他提议“1. 在武汉设一最高之组织机关,机密之中联络各个团体,加以训练;2. 多派文化界中分子前往活动。如有大规模之稳健学术的刊物在汉发行,尤为得策。然此种工作,不宜使社会视为中央之工作或蒋先生之指导。必须保持若干之中立性,始便于谈话也;3. 《独立评论》有恢复之意,若能加以扶持,有极大之效益;4. 中国青年党有在汉办一刊物之计划。若能略加扶助,尤胜过本党自己负责发言;5. 慎选有力学者加入武汉大学,以推动之。”^①陶希圣的建议将矛头指向了中共及人民阵线,并希望宣传上占尽先机。

这是艺文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在艺文研究会中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身兼数职,不但担任设计总干事,同时还兼任研究组主任干事,与侯顶好共同主持经济考察团,与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主持编译委员会。与此同时他还是艺文研究会理事会理事和理事会总干事。陶希圣吸收“食货派”^②为“亲军”,其中有沈巨尘、武仙卿、鞠清远、曾霁、何兹全等,作为研究组的研究员。艺文研究会虽然得到蒋介石每月四万元的资助,但主要还是由汪精卫具体指导,社内的情况陶希圣随时向汪精卫请示,而汪精卫对于该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地加以指导。陶希圣后来说“二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③

艺文研究会的任务有三“第一,要树立独立自由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④具体来讲该会坚持的基本观点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坚持“民主政治不是政治割据,要把割据当成民主,是历史的倒退,不是社会的进步”,将矛头对准中共及其根据地;同时它还认为“民主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民主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民主政治所不许的”^⑤,即在外敌入侵之时,民主政治并不允许反对政府的现象存在。艺文研究会一度指导几十种报纸和杂志,出版许多书籍和丛书,“艺文丛书”之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办了几种刊物,比如《政论》旬刊;艺文研究会下的出版组建立了独立出版社,用来编印小册子;香港分会设有“蔚蓝书店”,出版刊物有《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每周为汪、蒋提供一份国际时势的报告;该会还资助由平津出来的学术文化界人士,也资助一些报纸。据蔡德金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

艺文研究会的第二个任务是“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⑥陶希圣借助于艺文研究会这个平台,继续唱“低调”。他把1937年底至1938年3月发表的文章收集成册,作为艺文丛书之三,以《欧洲均势与太平洋问题》命名,193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陶希圣的文中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世界上各国之间,只有利害的关系,主义集团之类都是空洞的名词。阵线外交,像德、意、日阵线和英、美、法和平阵线都是想像的理论,真实的国际关系只是利害关系。”^⑦各国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制定对外政策。求和平避战争,是各强国基本准则,所以他们

① 《陶希圣致蒋中正汪兆铭函》(1937年11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战时重要措施(二),002—080101—000150—015。

② 1934年12月1日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自任主编,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等人,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被称为“食货派”。1937年7月1日《食货》半月刊停刊。1971年4月陶希圣在台湾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至1988年3月停刊。

③ 《陶希圣给胡适的信》(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④ 《陶希圣给胡适的信》(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⑤ 《陶希圣先生会谈记》,《政论》1938年第1卷第6期。

⑥ 《陶希圣给胡适的信》(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⑦ 陶希圣《欧洲均势与太平洋问题》,“序言”,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无论如何不肯任意揭开世界大战的主力战一幕,这种国策是不变的。战争总是发生于强国与弱国之间,其他强国不会轻启战端,往往牺牲小国,以重新调整国际新的均衡。大战表面上看总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往往是虚晃一枪,而最终牺牲的却是小国。“列强希望的是中日冲突,同时希望他们自己与日本缓和。他们以中国的抗战为机缘,缓和他们的矛盾,寻求他们的均势。因之,国际大势已经是和局,只有中日之间是战局”。^①中国不能幻想得到外来的援助;陶希圣更不主张中国民族为世界和平或是集体安全而牺牲。他认为中国所以为国际和平而战,是因为国际和平是中国民族生存的条件。中国之战,说到底是为了中国民族的生存。中国决不能为了国际的苟安而牺牲民族的生存。他强调如果明白了这点,在集体安全被破坏,各国寻求新均势的当时,中国政府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应当检讨,并有必要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

1938年陶希圣在《扫荡报》、《武汉日报》发表《日本的歧路》。表面上看,他在揭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实质则是透露日本有寻求和平谈判的可能。他分析说日本在军事上,海军的南下与陆军的北上充斥着矛盾。他认为日本北进的计划已经完成,在占领了中国北部内蒙、冀、鲁、晋之后,日本陆军想取其所得,不愿因海军的南下而使他们陷入第二度的难关。所以陆军主张缓和,并在御前会议里抑制了海军的南下计划。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国内的军阀与资本家之间也有矛盾,资本家不愿意再战,再筹军费。因此,陶希圣认为日本国内有求和的意愿。更何况“在这个英美轴心的世界外交局面里,日本很难打到底。日本对于中国,除了树立新政权一条不好走的路以外,仍只有撤兵言和的一条路”。^②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签订,陶希圣很高兴,他分析在意英及德英关系正在好转的今后,日本不冒险即屈服,如冒险只有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淖之中。中国应该与日本言和,而不是打下去。这就是陶希圣的所谓“和平”理论。

艺文研究会的第三个任务,在于寻求与日本和谈的现实道路,主要任务由香港分会完成。陶希圣说:“……香港设立的分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梅思平和高宗武负责,表面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选择外国报纸刊物上的资料,提供给武汉,实际上担负着一些秘密的使命,比如与日本方面联系。”^③

1938年12月22日,陈布雷得知周佛海、陶希圣双双辞去艺文研究会之职,十分不解,他没有想到这两位主要负责人已经出走越南三天了。随着汪精卫集团的投敌活动的展开,艺文研究会这个一度庞大的组织很快瓦解,1939年2月,艺文研究会解散。

三、“主和无罪”与组府不可

1938年12月31日即“艳电”^④发表两天后,陶希圣给胡适写信,对于他们离开重庆的行动做了说明,并为以后与重庆方面言和留了后手。

陶希圣除了重申日本已有了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意愿外,强调中国不具备与日本打下去的能力,他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开支廿七万万,收入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这时候,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开

^① 陶希圣《国际的又一幻想》(1938年1月10日),《欧洲均势与太平洋问题》,第14页。

^② 陶希圣《日本的歧路》(1938年1月27日),《欧洲均势与太平洋问题》,第24页。

^③ 《陶希圣给胡适的信》(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④ 艳电,即1938年12月29日,身处河内的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给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所发的电报。电报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和共同防共”的“近卫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29日电报代码为“艳”,故称“艳电”。

会,共产党挑起汪、蒋的感情,使其疏远,同时对我下严重的警告。他们说话,明白说俄国不能进一步相助,又明白说中国曾斩绝伦敦路线,只走莫斯科的路。”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之中,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令他失望,因为“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全部的计策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①

陶希圣信所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近卫三原则”^②在陶希圣等人看来,没有超越底线,根据这个声明谈判,有望得到和平并保持中国的主权,因此,汪精卫响应是正当的。2.他们为了促使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言和,前后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努力,也就是说他们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就着手于此,可谓用心良苦。3.现在,他们意识到蒋介石是不可能谈和的,于是为了“负起责任”,准备孤注一掷,离开重庆与日本谈判,但是,他们的行为绝不是抛弃重庆另立中央。即所谓:“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的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③他明确告诉重庆,他们不否定蒋介石中央的权威,而是彰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为中国寻求一条和平的道路。

“逼”蒋与日本和谈的想法,并不仅仅属于陶希圣个人,或多或少地代表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高宗武等人的最初约定。但是,似乎只有陶希圣、高宗武坚持这个约定。因此,当汪精卫改变想法,或亮出自己真实的意图——另立中央之后,陶希圣和高宗武的坚持,使他们在“和平运动”人士中日趋孤立。

1938年底“艳电”发表以后,关于汪精卫的去向问题,“和平运动首义分子”^④发生了争论。陶希圣和高宗武主张去欧洲,周佛海与梅思平则希望汪去敌占区,相持不下,最后汪采取折中的办法,留在河内观望。这是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一次见解之争。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1938年12月29日,陶希圣、周佛海和梅思平前往香港,从事所谓的“和平运动”。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不甘寂寞,制定关于组织伪政府、实现中日和平的方案^⑤,派高宗武前往日本试探是否支持自己组织政府。高宗武回国后的3月18日,接到日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军统特务冲入汪精卫等人的住所刺汪未遂,却将汪的亲信曾仲鸣打成重伤不治身亡。汪精卫大怒,决定离开河内。同处香港的周、梅、陶三人,为了汪的去向再次发生争论。梅思平攻击不在场的高宗武,说高与重庆方面勾结,猜测高的任务就是不让汪精卫开展所谓的“工作”而让汪精卫到欧洲去。面对梅思平嚣张的气焰,陶希圣也不示弱,他说“其时,学(陶希圣)本主昭公(汪精卫)游欧,得此乃更加力主,比及大家在座,而学主昭公游欧,则福(梅思平)之厉色严词以相责矣。”^⑥梅思平不

① 《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② 日本近卫内阁先后共发表三次对华声明:1938年1月16日第一次声明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1938年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声明,即“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第三次是1938年12月22日提出有关调整中日关系的“近卫三原则”。

③ 《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胡适档案。

④ 汪指定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为“和平运动”的最高委员,又称“和平运动首义分子”。为了便于保密,他们各自有一个代号,以便联络。陶希圣为“学”;汪精卫为“昭”后又改为“明”;陈璧君为“兰”后改为“菊”,陈公博为“群”;周佛海为“典”;梅思平为“福”;高宗武为“深”;林柏生称“琇”。

⑤ 制定了三种预案:1.日与蒋妥协,建立由日本操纵的政府;2.建立由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等共同建立的统一的中国政府,汪以在野身份协助;3.以汪为核心收拾局面,组建政府。

⑥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与汪政府各省市长函,118—1010100—0019—044。

但攻击了高,同时也严厉地指责了陶希圣,内部争执更为明显。

曾仲鸣被刺后,陶希圣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服从重庆中央政权。他在“檄文”——《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中称“吾人今日欲质问重庆之执政,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不同,可决于民,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以摧毁此无心机无防备之在野领袖?”又称“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汪先生此种精神,此种努力,无一不为国民政府,亦无一不为蒋先生,且无一不与蒋先生和衷共济。”“夫中华民国为求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败则战争终于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表面言之,战与和固不兼容,而进而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①这段写于曾仲鸣身亡次日,即3月22日的文字,是陶希圣为“和平运动”做出的最有激情最堂皇的辩护,其主旨与他三个多月前致胡适的信没有多少变化,即离开重庆,在外围从事“和平运动”。这一点,从参与策动所谓日华“和平运动”的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供词中得到佐证“关于汪先生开展和平运动的以前计划是:以国民党员为中心,在国民中间掀起和平热潮,使国民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不打算建立政府”。^②他所说的“以前计划”指1938年4月18日前影佐所掌握的汪精卫的意向。

事实证明,陶希圣败了下来,汪精卫没有去往欧洲或其他地方,而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于4月25日乘船到达上海,并入住日本控制的虹口区。

在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前,4月18日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前往上海,为汪的到来做准备。陶希圣则仍然留住香港,不论是否出于陶的意愿,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陶被边缘化了。但是,他仍然想对汪施加影响,尤其当他得知汪精卫决定亲自前往日本后,陶希圣5月14日给汪精卫、陈璧君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汪精卫根本不该亲自赴日,作为最后收拾时局的人,汪精卫对外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只有当和约签订后,才可以去访问,如果现在冒失而去,“若设成而入京,无异于王梁(王指王克敏;梁指梁鸿志——作者注)诸人;访日以后自增身价,且访日与晋见何异,不过体制较隆”。对内,他提醒汪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在两国仍在交战的今日,汪的赴日,一般国民会怎么看?他说现在情况下的访日,“决不能与议和之后之访问相提并论,故在宣传上隙似最巨”。他提请汪精卫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能忽视人们对自己的基本评价,他非常清醒地看到“急进主义者(指周佛海、梅思平等——作者注)或以为后方文人心理不必顾虑,然公之见重于人乃正在此种心理上之地位,如舍弃心理于不问,则何以自别于王梁,身既不能自别于王梁,今后亦唯有与王梁效太平天国时期比头发之长短以论资格。公当能知王之头发已一年半,梁亦满年矣!后来居上,日有齟齬,又何以立政乎”?他尖刻地提醒汪精卫:他的资本不过在文人圈里尚有同情者,如果将这一点也丢失,就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他甚至将汪的不妥当行为,视为自轻自贱,他说“今日最看不起先生者厥有三人,其一即公自己也。”陶所述十分尖锐,虽是衷言,但几近骂人了。

陶希圣信中阐述的另一个问题是组府不必着急,要等待时机。他以一个师爷般的立场进言:“若革命则须趁热,若今日则反之,由主和而走入对方后方,此其距离在一般心理上巨远远,故必表现其不得已,必表现其迟回,始可得一般之谅解。况对于对方尚须有郑重以免其轻视之我乎。”^③

①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34页。

② 益井康一著,季云飞译《影佐祯昭供词(节译)》,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20页。

③ 以上引文,均取自《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37。

陶希圣对于积极主张组织伪政府的梅思平、周佛海十分不满,以为周、梅动机不纯。陶希圣甚至写信向汪揭发周、梅,他认为周、梅十分担心汪精卫的旧人之间的团结,所以竭力挑拨;尤其重要的是“彼等常以为汪、蒋两派本常有分合,他日若两派再合则彼等无自容之地,故对群(陈公博)学(陶希圣)缓进之表不独反驳,且而愤恨”。称这是自己数月来和周佛海、梅思平同住,了解到的他们的心理活动。

陶希圣甚至有点卑鄙地提醒汪精卫要警惕周佛海和梅思平的政治野心。他说周佛海和梅思平属于新参加进来的人,他们“有意以典(周佛海)为首领,谓为‘汪周合作’,而非以周投汪,此为一种自爱心理,故常谓‘昭公(汪精卫)老矣,继之者群乎?典乎?’”尤其是梅思平,资历较浅,以讨好他人为能事,拉小团体,结果形成这样的处事办法“举凡一事,彼等(周、梅等人)先有集议,然后运用各种方法以应付,两公(指汪精卫和陈璧君)岂有讨论之余地乎?”他坚持凡事不能都托给周、梅,汪精卫应该直接控制。他虽然不赞成汪精卫过早东渡组府,但又提醒汪以后在组府时,“指定亲信之人驻东京为传达,则此小集体之操纵则可预防也,否则两地传言利归经纪矣。此取要之‘术’不可不预思者也”。他说“蒋先生之手段虽不可尽取”^①,但蒋所用之“术”却是值得汪参照的,建议汪精卫多设耳目,以免被他人迷惑。陶希圣在此用上了离间计。陶希圣推心置腹的话完全无用,5月31日,汪精卫赴日,同行的队伍里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没有陶希圣。

从现有史料来看,1939年4月到6月是陶希圣最为纠结的两个月,他一再宣称将要离开汪精卫,但又没有离开,犹豫徘徊之极。陶希圣的犹豫表现在组府这个关键问题上。以陶希圣的敏锐,他应该很快明白汪、梅、周的目标就是组府。他在给汪的信中,曾经说道“自河内商定名单之后,福兄即谓‘党归改组派政归新派’且谓‘内政与财政经济眼前空虚在都城饭店都甚不舒适’,学为之解释以为‘内政,此时应物色多人分途考察以为将来地方政治之准备,凡教育、交通、治安、水利莫不分属;至宣传,目前需要大家努力,愿兄相共于此’。”^②这说明汪集团到达河内后就已经抛开重庆而着手组府,陶希圣信中所述,似乎默认了组府一事。这与他给胡适的信和公开表态相左。

1939年5月14日陶希圣给汪、陈的信,一面咬牙切齿地说“学党不得不退,若仍不退将为廉耻及脸面问题,非但工作不能进行,抑且将成无聊、无赖、无耻……”一面又说“学退出理事会后将专事外围工作,一则扩大学界之联络,二则于收来政权之后以收拾教育界自任——为适应外围之学界心理,不可不急剧表现于非,不可不急剧表现其热中,故引退以待其时或可更多贡献于我公也。”^③表示对于教育部有兴趣,且自己正在为以后能在教育部任职做准备。说明,他还是有留下来的意愿的。

6月22日,陶希圣先后给尚在日本的汪精卫发去三封信:第一封信讲自己无论如何要走了,准备去美国留学^④;第二封信请辞去理事、常务理事、党务委员、宣传处长之职,因为被指责“无工作、无计划”,所以辞职^⑤;第三封信主要汇报他所派的学生武仙卿在北平从事“和平运动”的情况,及自己的努力和处理意见。其中包括:1. 对北平旧交进行游说情况,如北大“旧同志”已联络并召集;

^① 以上引文,均取自《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38。

^②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118—010100—0019—044。

^③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37。

^④ 《陶希圣致汪兆铭函》(1939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42。

^⑤ 《陶希圣致汪兆铭函》(1939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40。

剩余名流之联络亦“略得端倪”；“吴小玉之高级参谋及实际练兵指导者为罗虔(致坡)、汤芑铭,皆为学之乡友,近数年来往来颇密,而罗为戚属,尤有关系”；“齐抚万之联络,除学在平相识外,夏(管)冀贤可以往之”；“汤尔和董康则由学界旧游,易于相见”等等,充分说明自己在北平颇具人脉；2. 告诉汪精卫,自己曾经嘱咐武仙卿到了北平,一般不要与人谈政治,除了“最密切之人士,可表明汪先生之主张为(1)统一政府,(2)以均权求共治。此两点皆得政界之同情,一般推测王董氏^①虽不愿拱手,但不得已时,必能安于分权共治也。分权共治的主张现已为彼等内部所认识矣”,他表白了自己已经尽力地推行了汪之政策,而且肯定了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可行性,表示自己愿意而且能够替汪出力。陶希圣以隐晦的方式告诉汪精卫他已经按照汪的意旨从事于组建统一的伪国民政府的工作。3. 让汪精卫对日本人存有警觉之心；4. 信的末尾,陶写道“如需要武同志赴沪面陈,奉电即往。”^②上述三封信,明里是要走人,暗里却想留下,并希望得到汪的挽留。

陶希圣的变化,自然受到汪精卫的欢迎。1939年8月28日,陶希圣一人前往上海,参加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伪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伪宣传部部长。虽然陶希圣早就知道“虹口之地为非坦途”,一度因此“望而生畏”^③,最后,还是住进了上海虹口区汪精卫的家里,准备投入建立傀儡政权的工作中去。

从这一阶段陶希圣给汪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为汪精卫组府做了不少的工作。最先着手的是宣传工作。他说自己“委屈周旋,腆颜支撑”终于将宣传部搭建了起来。到1939年10月,宣传部第一、第三处已经建成,第二处的费用也准备好,并奠定了《中华日报》的“初基”,建立了中华通讯社,所以,基本上将宣传这一部分拼凑起来。为伪政府纠集有影响的人物是陶希圣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拉拢实力派人物吴佩孚;给陈宦等人送钱;利用同乡关系接近刘菊村;利用自己学者的身份,游说于学者之间;介绍所谓有志向的人,参加“和平运动”;他还在各伪组织之间穿针引线,比如接待王族成员金璧东,并让他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等等,动员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加入到所谓的“和平运动”中来。但陶希圣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当属1939年11月,被汪精卫指派,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起,与日本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等就日本内阁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进行谈判。

回顾陶希圣由成都到河内,由河内到香港,由香港到上海,除了最初一步外,以后的每一步看起来都非他所愿,但是他还是一步一步追随汪走了过来。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差别在于“相随至于百分之九十九,不过剩下‘上台’之一分未能放弃主张以相从到底”。^④

四、逃离“和平运动”及其意义

陶希圣之所以最后离开,虽然与权利之争有关,但更多的是关于“和平运动”内涵的理解不同,底线划分不同。周佛海曾经把从事“和平运动”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主张“以在野的立场集合同志,以宣传和平运动”,一部分人主张“以在野的立场进而组织政府,以实现和平运动”。^⑤陶

① 王即王克敏,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部部长;董即董康,伪华北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② 《陶希圣致汪兆铭函》(1939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43。

③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38。

④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谭延闿、庞炳勋、吴文化、陶希圣、孙科致汪兆铭函件,118—010100—0054—038。

⑤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40年7月5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5页。

希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第一类人,具体表现在陶希圣反对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不赞成汪去日本、反对汪到日租界、力阻汪去南京。为此,他还遭到周佛海、梅思平的敌视和排挤。他负责的工作,得不到掌管财政的周佛海的支持。周佛海、梅思平这两个由他介绍给汪精卫的后人却抢尽风头。他们不仅仅反对陶希圣所提的主张,且以讽刺、谩骂等手段孤立、轻视陶希圣。更严重的是,由于汪精卫的意见“与福(梅思)典(周佛海)同”而与陶希圣不同,陶希圣深感“学自无立足之余地”^①,不得不多次提出辞呈。

事实是1939年5月,陶希圣有了离开汪集团出国的想法,并已着手向重庆方面求援。5月11日、12日,蒋廷黻、彭学沛分别收到陶希圣的信,信中陶希圣“表示不赞成汪积极当汉奸”^②,军统知道陶的心意后,开始有所行动。陈布雷5月25日也说“希圣自港来函,似有悬崖勒马之意,然为时已迟,何从使其自拔乎。”^③6月5日,陶希圣写了一封信给他昔日的学生何兹全,表示自己坚持和平运动的原始目标未变,虽然处境极苦,但无怨无悔。这封信和以前不同的是,他虽然没有放弃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在结束战争这样的观点,但他同时也承认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日本有实行长期战争的可能,为此,“以汪树立新中央政府,为其长期战争中不可免之事”。信中,他完全意识到汪伪政权的建立,恰恰不是和平的到来,而是和平无望的结果,起到延长战争的效果。日本想尽快结束战争,所以不会急急地组织汪伪政府,但“如其无法劫制国府讲和,始出于此一着。故汪之于彼更具体切实之把握,彼虽不弃汪,亦不愿即斩断国府之路。因之谓汪即将组府者,姑无论汪之下有人力主与否,断不能很早成为事实也”。他推断如果三个月内汪政权不建立“则战争之结束未始无望。此间盛传秋季结束战争,盖非无因”。陶希圣经过理性的分析,结论是伪中央政权的建立,得到的不是停战,而是长期的战争。他在信的最后表示“弟今以在离去之夕矣。”^④因此,陶希圣至少给四个人写过信,表示离开汪精卫的决心,是有案可稽的。然而,如上所述,6月22日,陶希圣给汪连写三封信,曲折隐晦地表示了留下参与“和平运动”的意愿,并于8月到上海。

陶希圣之所以忽然转向,一则他或许得到了陈布雷的指示。6月2日在缙云山石华寺山中养病的陈布雷,给陶希圣回了一封信,交一名为唐锦山的人带到成都。^⑤信中所写内容不清楚。6月5日,显然,陶希圣还没有收到陈布雷6月2日的信,陶希圣又看到汪氏建立政权恰与“和平运动”初衷背离,于是,他给何兹全写信表示要离开“和平运动”。但是,陈布雷来信了,而且,内中或许有让陶希圣“自拔”的方法,可能的是劝汪出洋,或是带回汪日密约。于是,6月17日,陈布雷“又接希圣函,自白决不附敌。”^⑥既是承诺也是告白。

陶希圣敢于回上海,在于他对汪精卫有特殊的感情,希望自己能够劝他回头,并且他也有一定的自信。如前所述,5月14—18日,陶希圣十分激动,数次写信给汪精卫、陈璧君,痛诉周、梅排挤自己种种,称“最近此心异常烦闷异常动摇……此种心理将发展为反对运动亦未可知也。”^⑦坚决

^① 《陶希圣致汪兆铭函》(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118—010100—0019—044。

^② 戴笠给郑介民电“1. 陶希圣于本月徵(11日)文(12日)两日曾分别函蒋廷黻、彭学沛,陶确已动摇,请兄设法拉拢。因陶有赴欧之企图也。……4. 高宗武用化名请求办出国护照已批,不准矣。弟灵叩篠(17日)午渝”(《戴笠致郑介民电》,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戴公遗墨——政治类(第2卷),144—010101—0002—043)

^③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9年5月25日,第350页。

^④ 《陶希圣致何兹全函》(1939年6月5日),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363页。

^⑤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9年6月2日,第352页。

^⑥ 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样稿》,1939年6月17日,第354页。

^⑦ 《陶希圣致汪兆铭陈璧君函》(1939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37。

反对汪精卫东渡日本,并以辞职来威胁。他没有隐藏自己反对汪投敌的观点,并且将自己要离开的想法告诉了汪精卫。他的做法说明,他自信汪不会拿他怎么样,况且,他对汪还是有一份内疚的,他认为汪精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与他是有关联的。^①他决心到上海劝汪精卫离开,放弃组府工作,以下事实可以佐证:

1. 陶的女儿陶薰琴曾经回忆说,陶希圣去上海之前,曾经跟她谈话,告诉她自己去上海是为了劝汪出国。^②

2. 陶希圣在6月22日给汪的信中还说到武仙卿曾经拜访过周作人,周作人表示日方不可靠并担心汪先生“恐受欺”,陶希圣说“此语至是注意。”接着,他说“又观日方特务机关以有组织之力量操纵政府(指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使其上下不相属,左右不相及,人人以直接日人立足之基,此又吾人所最当警戒者矣。”^③他从日本人不可信的角度,借周作人之口,规劝汪精卫。

3. 他在参加《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时,发言不是很多。他提出建立新政府的主旨在和平,要求日本尊重新政府的主权,包括:反对日本派行政顾问;对于驻军问题提出应该将治安驻军与防共治军分开;还有经济、新上海等问题,力图将条约内容细化。他在谈判中曾经这样说“我是因为偶然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看到每天讨论的情况,日方是希望简单,中方要求详细;日方欲决定于将来,中方想马上决定。所谓简单是想留个余地,将来能够有所变动,如果太详细,将来想变更就很困难。反此,中方好像是怕将来日方变卦,因不欲变更,故想把它定得很详细。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将来可能发生问题。”^④实际上,他以委婉的方式,对于日方的诚意进行了否定。不过,私下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所述就不是那么委婉,他认为这个要纲暴露出苏德瓜分波兰后,日本与苏俄着手进行瓜分中国的大阴谋。他在回忆录里写到,汪精卫流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⑤汪精卫所述是实话,一个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人,没有资格签订国与国间的“调整要纲”,即使签订也没有法律效力,结果只是出卖了自己。可是,陶希圣却不想将自己卖了。于是,他离开了上海。

自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陶希圣经历了参与和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他的种种行为,围绕着一个问题:中日通过和谈是否能够达到和平。最初,他认为可以达到和平,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和平运动”:致力于“劝”蒋对日和谈,未果;然后,出走“逼”蒋对日和谈,造成一个以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问题的氛围,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他追随的“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踏上了投敌之路,当汪精卫要到敌人控制区去从事“和平运动”时,陶希圣及时与重庆方面接触,试图回归,期间,虽然他的行为有摇摆,但认识还是清醒的。就如他自己后来说的“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⑥1940年初,陶

^① 1940年9月5日陶希圣至高宗武信中说自己“行年四十,自为作事之时期,然以昭(汪精卫)等一脚踏错,惟有自艾,何况其踏错之一脚,弟亦有一分责任乎?故主观上应有自责之勇气。”(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②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62页。

^③ 《陶希圣致汪兆铭函》(1939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汪政府各省市市长函电(一),118—010100—0019—043。

^④ 《关于中日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议纪录》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第154页。

^⑤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65页。

^⑥ 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303),大象出版社2009年影印,第86页。

希圣和高宗武一起,带着《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个密件,来到香港。在投敌与“和平运动”之间划了界线。

“高陶事件”发生于抗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世界性的反法西斯阵营尚未形成。陶希圣、高宗武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归,需要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最具意义的莫过于披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长期以来,日本以蚕食鲸吞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地侵略中国。但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最后底线到底是什么,是全面侵华还是局部的侵略,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计划,其结果让不少中国人存有幻想。即使如蒋介石,七七事变一开始,对于日本方面的意图也把握不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推断日本此次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为了乘我们准备未完之时迫使我们屈服?为了为难宋哲元?为使华北独立化?他问自己“决心应战,时其时乎?”他不能断定中国是否到了应战的时候;他甚至希望事情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注意:1. 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2. 归宋负责解决。3. 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4. 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5. 积极运兵北进备战。”^①因此,他对于日本的底牌十分关注。而汪精卫同样想知道日本的胃口,正是在汪精卫的坚持下,日本拿出了这份《日汪密约》。该密约的公布,揭示了“和平运动”的末路,使中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不能与虎谋皮,和日本侵略者没有和谈的可能。

陶希圣在“和平运动”的发起、实施及理论的提出方面,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尤其在最初阶段,陶希圣是汪精卫最得力的智囊。虽然,陶希圣后来逐渐被汪精卫冷落,但是,陶希圣对汪精卫而言,应该算是仅次于陈公博的心腹。陶希圣的背离,不但使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和平运动”失去了一员干将,由于陶希圣的反戈一击,将其卖国不堪的一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曝光,“和平运动”不再具有理性和爱国的正义性。周佛海为此痛哭,并说“和平运动至汪先生《艳电》前后,空气极佳,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目前形势,险恶万分,加以中央政府三月内不成立,则和平运动即将解体也。”^②并称“高陶发表文件,于吾辈大有不利,补救之法,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第一、最好(最小限度)须日本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第二、国旗上拟加之飘带取消;第三、日本早承认新政府”。^③虽然,飘带后来还是加上了,但是,“高陶事件”至少给伪政府的建立制造了难度。

与此相反,陶希圣的回归,令坚持抗战的人们欢欣鼓舞。蒋介石在1940年2月29日本月反省录中,讲到“高陶事件”的意义时说:今年二月和去年情势相比“已较宽裕多矣。去年汪逆出走后敌伪阴谋日亟,全国人心亦几动摇,今则敌汪密约揭露,高陶脱离汪逆,敌寇虽急求汪逆伪组织出现,料必获致恶果无疑,此敌在政治上之惟一致命伤”。^④主战的重庆政府掌握了主动权。2月1日蒋手谕陈布雷、叶楚傖分电各省省党部,“令就近多翻印《日汪密约》与本人《告全国军民书》、《告各友邦书》以及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及致汪逆等函电,印成专册,分送各级党部与附近军警及各级学校,以供阅读”。^⑤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人们明白,除了抗战,别无退路。

(作者贺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转引自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12页。

②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2月22日,第250页。

③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1月27日,第238页。

④ 萧李居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217页。

⑤ 萧李居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110页。